

罗根泽 著

LUO GENZE ZHU

中国文学批评史

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上海书店出版社

1206.09
L919

罗根泽 著

LUO GENZE ZHU

中国文学批评史



A1100780



上海书店出版社

H1198/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1

ISBN 7 - 80622 - 917 - 5

I . 中... II . 罗... III . 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
IV . 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126 号

责任编辑 徐力励

封面装帧 范峤青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中国文学批评史

罗根泽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17.75 字数 44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 - 80622 - 917 - 5/I · 190

定价: 35.00 元

序

周勋初

中国史学起源甚早,成果也多,但偏于政治史一类,其他各种学术史则发展得很迟。因此,中国过去只有“文苑传”一类的记叙,没有出现什么中国文学史类的著作。

西学东渐,中国学人在新形势的激发下才有这一类新型的著作问世,而在文学史类的著作中,日本学者的早期著作起到了参考和激励的作用。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努力吸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成果,用以形成新的学术观点,解决本国的问题。自唐代起,日本在中国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汉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至是日本学者乃参照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和著作体例,编写“中国文学史”一类著作。其时中国为了挽救帝国的危亡,开始派遣学生赴日本学习,私人去留学的为数也很多。自清末起,也已出现私人编撰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年代要晚些。铃木虎雄编撰的《中国诗论史》于1925年由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之前已有论文陆续发表。时隔两年,陈钟凡先生编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于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南京地区的一些学者首先在大学里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胡小石先生在金陵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开始积累中国文学批

评史方面的材料,陈钟凡先生则在东南大学开设此课。胡小石先生于清末在两江师范学堂求学时,学的是农博科,教师中有从日本聘请来的教授多名,因此他在学生时代就已通晓日语,从而了解到日本学术界的动态。他在自撰的《中国文学史》中表明曾经阅读过蜷川种郎等人的著作多种。

胡小石先生和陈钟凡先生是两江师范学堂的同学。两人在南京一起筹划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设,经常交换资料与心得,其后陈钟凡先生将讲义交付在中华书局任职的左舜生,并立即出版。胡小石先生在金陵大学讲授此课时本来也打算编撰一种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然仅完成稿本而未及定稿,其后更因时局动荡而被迫停止。

胡、陈二人的学问成熟于清末民初,因此在著作中留下了早期学人的痕迹。他们对古代文献极为熟悉,而在撰述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使用的材料,以及编写时所使用的笔法,仍深受传统的影响:除了诗文评部分外,不出历代文苑传、诗文集和若干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他们介绍这些材料时,大都随文敷衍,略作阐释,这对后人来说,自然觉得新意不多和分析不够细致了。

其他地区受新文化运动熏染更深的一些学者,从事这一新学科的建设时,对文学批评这一新的观念作了更为深入的钻研,因此在采择材料和组织成文时,显得更为符合现代学术规范。

20世纪30年代,郭绍虞先生、罗根泽先生在北京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先生在武汉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并各有著作行世。中国学术界一致认为,三人可称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新学科的奠基者。

三人中,郭绍虞先生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年代略早一些。他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任主任时,即已集中精力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后罗根泽先生进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当研究生,从冯友兰、黄子通先生学习哲学,也已开始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因为郭

绍虞先生同时在研究院任导师,故罗先生亦以师礼事之。其时郭绍虞先生还在清华大学兼职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后来燕京大学作出新规定,本校教授不得在外校兼课,于是郭先生乃推荐罗先生至清华任教,罗先生遂将主要精力转向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

朱自清先生曾在评介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时说:“‘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这是西学东渐之后的大趋势,中国文学批评这一领域自不能例外。但可以看出,中国学人处在这一潮流中,一方面参照西方的文学观念,用来考察中国学术,以期在筹划新学科时能有新的开拓和建树;一方面则坚守中国学术的本位,力求从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中发掘出固有的体系,梳理出一条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实际的历史发展线索。

郭、罗、朱三人中,朱东润先生的外语水平最好,能够直接阅读国外学者的英语著作。他的《文学批评史》中,时而径引某一著作或某一学说作参照,如在研究司空图的诗论时,引 H. G. Giles 所著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的论点分析其思想,并进行考辨;又如他在论述唐人诗论时,将殷璠、高仲武等归为“为艺术而艺术”类,元结、白居易、元稹等归为“为人生而艺术”类,于此可见其寝馈西洋学术之深。

郭绍虞先生在北京任职时,古史辨派中人发起的学术论争正在激烈展开,这对他的学术活动当有影响,他曾声称:“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他在撰史时首先对儒道两家对文学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进而对文学批评中的一些术语,结合不同时代的思想潮流进行分析,而这也是郭著批评史中最具特色的地方。

罗根泽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学

习时,以先秦诸子和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因而注重理论上的钻研。他在从事批评史的研究时,首先对文学批评的内涵作了深入的探讨,这方面的成果,反映在《批评史》的第一册第一篇第一章中。

罗先生在《绪言》中引用了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外著作,如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中的理论,进而分析中国古代的相关论述。因为引证与论述的文字颇多,所以朱自清先生在称赞罗著《批评史》的同时也批评“《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著者正是凭借这种细致的辨析,才能如朱先生所说的,“能够借了‘文学批评’的意念的光,将我们的诗文评的本来面目看得更清楚了”。罗著《批评史》中有许多新开拓的领域和新发掘的材料,正是“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

这里可举《文心雕龙》一书为例,将同时产生的几种批评史作并行的比较,以示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如何借了“文学批评的意念的光”,认识到此书的重要价值,从而将其安排在突出的位置上。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已给《文心雕龙》一书以重要地位,但未列专章论述。第四篇第二节第二目“《诗品》与《文心雕龙》”中,介绍得很简单,第三节《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内,虽然在“形文与声文”、“情文”、“风格”、“体制”、“文笔之区别”五目中也介绍了刘勰的学说,但似都把他的相关理论作为例证而提出,最后又在相隔两节之后安排了《刘勰与复古思想之萌芽》一节。由于内容分散,《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也就难于把握,其他一些见解深刻的文学理论也未见介绍。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一书,列

有《发挥“文德”之伟大是刘勰的大功》一节,介绍的内容极为简单。作者何以仅着眼于此,或许与他出身于桐城世家有关。

返观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于《文心雕龙》一书的介绍与评价也就有所不同了。书中专设《论文专家之刘勰》一章,内分“一、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家”,“二、作《文心雕龙》的动机”,“三、几个主要的文学观”,“四、文体论”,“五、创作论”,“六、文学与时代”,“七、批评及其原理”。可以看出,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主要问题确已一一抉出。这也就是说,罗先生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价值和内容已能全面而明确地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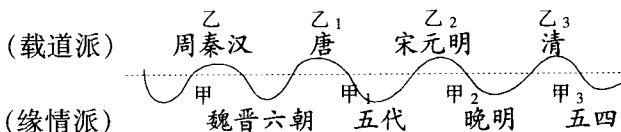
按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于1934年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罗著的周秦汉魏南北朝部分同年于北京人文书店出版,方著《中国文学批评》同年于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应该说,罗著在批评史的撰述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也可以说,后起的各种文学批评史中对《文心雕龙》一书的阐述当然有深浅之别,但从其基本格局来看,变化不大,于此可见罗著《批评史》对后来这一学科的发展影响之大。

罗先生凭借他对“文学批评”内涵的理解,大力发掘有关材料,这方面的成绩,博得了学术界的公认。郭绍虞先生在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作序时说:“雨亭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他不是先有了公式然后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一些人人习知的材料,稍加组织就算成书的。他必须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结论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当文学批评史这门学问正在草创的时候,这部分工作是万万不可少的。而雨亭用力能这样勤,在荦路蓝缕之中,作披沙拣金之举,这功绩是不能抹煞的。”这样的评语,出于同一专业的权威学者之口,

当可作为定论。

罗先生对材料的处理也下了很深的功夫,在编著的体例上也作出了贡献。他参照古代史书的体例,揭取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之长,创立一种“综合体”。从全书看,材料的安排确很妥帖,既能照顾时代的特点,又能“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入各章各节,各个时期的一些伟大批评家,则特设专章加以叙述。如此安排,可谓纲举目张,巨细无遗。由此可见,罗先生既能从西方新兴学术中获取新的观点,又能结合本国文化的实际情况去熔铸新知。他之所以能在这一领域中取得杰出的成就,决非偶然。

但也应指出,罗先生在《绪言》中介绍了很多西方有关文学的学说,而对据以构建全书框架的一种学说却未明言。读者如细心阅读,即可发现书中常用载道、缘情或尚用、尚文这两组对立的概念去分析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各种文学思潮的冲突与发展,而这或可根据《绪言》中“历史的隐藏”一节中的解说拟制一表加以概括:



这一研究成果,体现了罗先生的努力方向,试图以此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规律。但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都是极为丰富多彩的,研究者的视角如仅偏于一端,则每陷于片面。即使对某一具体的文学批评家而言,理智与感情也是无法割裂的。研究者不能过分强调一点而忽视其另一方面的表现。例如罗先生在论述晚唐五代的文学批评时,为了勾出一条从“尚用”向“尚文”转变的线索,也就把皮日体和陆龟蒙二人的论点生硬地向一个方面靠去,仅强调其重隐逸和重形式的地方,而对他们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即批判现实的抗争之音和用世的理论,也就不能给予应有的评述。实

则其时尚有罗隐等人纷纷写作尖锐泼辣的小品,这些又怎能不予重视而将晚唐仅视为尚文的时代?

按文学中的这一理论,源于19世纪英人德昆西(De Quincey)的学说,他以为:“文学之别有二:一属知识,一属情感。属于知识者其职在‘教’,属于情感者其职在‘感’。”这种学说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就把中国文学分为“理智文学”与“感情文学”两大部分。“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学界一直流行这样的观点,以为文学是感情的产物,从而批判理智的干扰。罗先生在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受其影响,也就把古代的文学批评归为“载道”(或称“尚用”)与“缘情”(或称“尚文”)两大主潮了。

周作人于1932年间曾在辅仁大学作过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几次讲演,就把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看成是“载道派”和“言志派”的矛盾与递嬗。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常用“纯文学”、“杂文学”这种二分法来分析问题,朱自清先生指出这也是受了德昆西的影响,并批评说:“‘纯文学’、‘杂文学’是日本的名词,大约从De Quincey的‘力的文学’与‘知的文学’而来,前者的作用在‘感’,后者的作用在‘教’。这种分法,将‘知’的作用看得太简单(知与情往往不能相离),未必切合实际情形。”

由上可知,罗先生之所以如此立说,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罗先生毕竟是位“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自然会带有这一时代的特有烙印,因此我们阅读他的这一著作时,在充分肯定他的成就之余,也应把这看成是一部产生于特定时代的杰作,并以知人论世的态度来看待其中一些不足之处。

自序

余少好子集之学，长有述作之志。诸子百家，则作“探源”以辨正伪，作“集注”以明训诂，作“传论”以考行实，作“学案”以阐义理。历代文学，则先录“文学家传记集”，再作“文学家列传”，以述文人生平；先作各类“文学史”，再作“文学史类编”，以疏文学源流；先辑“文学批评论集”，再作“文学批评史”，以探批评奥蕴。资赋驽钝，人事倥偬，年至不惑，学无一成。“探源”“传论”，成书不全（“传论”止成《孟子》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探源”较多，单印者有中华书局出版之《管子探源》，余则收入开明书店出版之《古史辨》第四、六两册）；“集注”“学案”，汗青无期；“文学家传记集”则旧录已佚，新录未终；各类“文学史”，则《乐府》悔其少作（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他亦不欲问世；“批评论集”则充溢篋笥，徒自赏玩；“批评史”亦止此五代以上五篇，差敢写付梓人耳。

盖庄周论道，蘄察“古人之全”；荀卿劝学，必解“一曲”之蔽。况乎史之为书，职司载述，不该不遍，不足语于实录；予取予夺，何得称为直笔？至《春秋》立褒贬之义，《史记》成一家之言，斯则以孔子悯道不行，笔削以垂训，马迁受辱发愤，纂著以自明。后人无孔子之圣，马迁之贤，而妄以支离卑痹之说，谬附笔削一家之言，未有不王通《续经》，见诋通人者也。故今兹所作，不敢以一家言自诡；搜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偏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

致厚蔑古人，贻误来者。

一九二七年秋，负笈清华大学研究院。越明年，至开封，任河南大学教授。又明年，移保定河北大学。一九三一年春，即返故都。从此迄一九三七年芦沟事变，惟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赴安庆，任教安徽大学，余皆寄居北京，前后七年有半。故都多公私藏书，余亦量力购求，止诗话一类，已积得四五百种，手稿秘笈，络绎缥緲，闲窗籀读，以为快乐。最珍贵者，有明刊本宋人蔡传《吟窗杂录》，明人胡文焕《诗法统宗》。二书皆诗学丛书，收有晚唐、五代以至宋初诗格诗句图甚多，得以分述于五篇二、三、四各章，由是五代前后之文学批评，顿然炳蔚。其有公私珍藏，不能割让，或割让而索价太昂，则佣人缮写，亦积得数十册。闻傅沅叔先生藏有《永乐大典》本诗话数种，未及借钞，变起仓皇，至今犹于邑于怀也。又以诗话盛于宋，而宋人诗话，泰半亡佚，与内子曼漪，从《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诗林广记》及诸家笔记中，辑出数十种，颜曰《两宋诗话辑校》。事变后，浮海南来，道出徐、济，南至京师，北返开封，然后西走长安，又随西北联合大学，播迁汉上，虽续有所得，而博考无从。闻中央大学自京移渝，载书颇富，遂于一九四〇年一月，由陕入川，重理丛残，际千载复兴之运，述先哲不朽之言，曾曾小子，诚不胜欢忭鼓舞矣！

窃尝以谓古昔贤俊，学贵博综，运思含毫，吐纳万象，举凡天地之大，虫鱼之微，幽明之情状，古今之嬗变，以至六府三事，众技百家，莫不随意陈辞，即事为篇。摘金振玉者，最为文集；布实达旨者，汇为笔记；文集笔记者，儒先绩业之总萃，而文学批评亦寓藏其中。此外则群经子史，总集诗集，品藻之言，亦往往间出。余性鲁恣，不敢自信记诵，不得不一一绌绎。清顾炎武谓著书譬犹铸币，宜开采山铜，不宜充铸旧钱。文学批评史之山铜为诗话文论，而文集笔记则为沙金；因彼开卷已得，此必排简始见也。

日月遄迈，呆拙濡滞，肇造迄今，忽将十稔。始以讲授清华大

学,策蹇疾书,草成一至三篇;秋间增删复讲,翌年笔削付印(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事变后书店停业,印出之书,付之一炬)。而四、五两篇,又在师范大学,讲习编著,亦陆续脱稿。六篇以下,属写未竟,抗战军兴,故都沦为异域,已梓三篇,亦全数焚毁,故哀集董理,重托剞劂。陈钟凡、郭绍虞两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宗岳先生《中国文学批评》,日人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皆曾参阅;朱自清、朱东润、伍叔傥、汪辟疆、李翊灼、李长之、胡小石、吴世昌、楼光来、黎锦熙、刘盼遂、刘汝霖、储皖峰诸先生,皆曾商正;匡启之谊,所不敢忘。汉班彪论司马迁《史记》,“采获今古,贯穿经传,一人之力,文重思烦,故刊落不尽,多不齐全”。矧余不材,宁免疵累?世有君子,可览教焉。一九四二年双十节自序于中央大学。

付印时,以篇辞繁重,分为《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册,宋以后亦陆续刊布焉。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根泽又记

罗根泽
著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力励

封面设计 范峤青



目 录

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

第一篇 周秦文学批评史	3
第一章 绪言	3
一 文学界说	3
二 文学批评界说	5
三 文学与文学批评	10
四 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	11
五 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	13
六 文学批评与时代意识	15
七 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家	17
八 文学批评与文学体类	19
九 史家的责任	20
十 历史的隐藏	22
十一 材料的搜求	23
十二 选叙的标准	24
十三 解释的方法	28
十四 编著的体例	30
第二章 诗说	32

一 诗人的意见	32
二 古诗的编辑	33
三 春秋士大夫的赋诗	34
四 孔子的诗说	36
五 孟子所谓“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	38
六 荀子所谓“诗言志”	40
七 墨子的用诗	40
八 诗与乐	41
第三章 “文”与“文学”	43
一 古经中的辞令论	43
二 最广义的文学	44
三 孔子及孔门诸子所谓“文”与“文学”及“文章”	44
四 孟子所谓“养气”与“知言”	47
五 荀子的立言论准	48
六 《易传》对于文学的点点滴滴	50
七 墨子的“三表法”及其重质的文学观	53
八 晚出谈辨墨家的论辨文方法	55
九 老子的反对“美言”与提倡“正言若反”	59
十 庄子书中的艺术创造论、写作方法论及书文糟粕论	60
十一 韩非的反对文学及《解老》篇的重质轻文	65
第二篇 两汉文学批评史	68
第一章 诗的崇高与汨没	68
一 诗的崇高	68
二 诗的汨没	69
三 卫宏《毛诗序》	71
四 郑玄《诗谱序》	76
第二章 “文”与“文章”及其批评	78